

四大名劇



西廂記
牡丹亭
長生殿
桃花扇

点 校 王小雷 黄仕忠
康保成 欧阳光
责任编辑 梅季坤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四大戏剧

王季思 黄天骥 主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480,000 印张: 15.75 印数: 1—10,900

ISBN7—80520—323—7/I·175

定价: (精) 8.20 (平) 6.20元

(湘岳 92—10—1/2)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前 言

如果有人问，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：应是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。

《西厢记》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。

关于王实甫的生平，我们知道的不多。元人钟嗣成说他“名德信，大都（今北京）人”。明初贾仲明则给他写过一首吊词：

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，莺花寨明彪彪排剑戟，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，作词章风韵美，士林中等辈伏低。新杂剧，旧传奇，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。

从词里提到“风月营”、“莺花寨”的情况看，王实甫很可能是常与歌妓艺人生活在一起的“书会才人”，他的《西厢记》，在元明之际已被认为是“天下夺魁”之作。

据我们判断，《西厢记》大约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（1299—1307）之间。它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。这篇小说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，展示了唐代社会负心男子“始乱终弃”的爱情悲剧。到了北宋时期，这篇小说被收进《太平广记》，传播更广，苏轼、秦观等著名诗人对它有过题咏，并且成为民间说唱的题目。金代，董解元写了一本《西

厢记挡弹词》，他不仅丰富了《莺莺传》的情节，更重要的是赋予莺莺和张生以全新的面貌，强烈地突出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法的主题。在元代，戏剧勃兴，王实甫在董解元《西厢记》唱本的基础上，进行再创造，写成了“天下夺魁”的剧作。

在封建时代，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，婚姻要服从家族和政治的利益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成了禁锢青年的枷锁。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，首先在于它正面提出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主张，希望青年男女能够打破封建礼法的牢笼。在戏里，王实甫以生动活泼的笔触，揭示了封建礼法的维护者和争取恋爱自由的男女之间尖锐的冲突。老夫人是疼爱女儿的，但她更注重维护“家声”，认为无论如何不能“辱没了家谱”。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宣称要把莺莺掳去当压寨夫人的时候，从“家声”考虑，她不得不表示愿意把莺莺许配给声称能够以计退贼的张生；等到贼兵退了，从“家声”考虑，她便不愿意承担诺言，演出了“赖婚”的一幕。而后来张生、莺莺明来暗去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她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，也是因为担心“家声”受玷。很明显，主宰老夫人的行动的，正是在封建礼法遮盖下的家族利益。王实甫环绕着老夫人三番四复的变卦，揭示她的性格实质，给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的打击。

在男女青年不能自由恋爱的情况下，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莺莺爱起来了。他们在佛殿相逢，一见钟情；他们在月下吟诗，互通款曲；后来发展到传书递简，跳墙赴约，西厢幽会。这一幕幕反抗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”的行动，不知使多少卫道先生咬牙切齿，乃至把《西厢记》列为“禁书”；也不知使多少在

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青年男女，为之击节，为之陶醉，为之神魂飞越。它是在封建礼法夜幕下使人灵魂震撼的闪电。

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所处的不同环境，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。张生书剑飘零，功名未遂，一介寒儒，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勇敢的。莺莺作为相国小姐，表现就不同了，她爱张生，却又躲躲闪闪；她要依靠红娘的帮助，却又想瞒着红娘，不肯让红娘晓得她内心的秘密。王实甫细致地刻划莺莺在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变化，使她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，也让观众看到青年男女要战胜封建制度是多么的艰难，他们固然要敢于突破种种世俗偏见，还要挣脱自己在心头上的枷锁。我们认为，王实甫高明之处，在于他能洞察不同身份教养的人的内心世界，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。正由于《西厢记》的戏剧冲突，是以人物的性格冲突为基础，因此显得特别富有生命力。

《西厢记》的语言，本色与文采交错，使人读来满口生香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，应从喜剧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，才可以准确地理解它的艺术魅力。

在我国，戏曲的喜剧性人物，多半由丑角或彩旦扮演，剧本则以夸张的描写使观众捧腹。《西厢记》与一般喜剧不同之处，是它主要通过揭示人物性格的缺憾令人解颐。正如别林斯基所说：“喜剧性因素隐含在如实的现实里面，而不是在漫画和夸张之中。”因此，人们看《西厢记》，总觉得笑得真实，笑得有味。

王实甫安排莺莺和张生结识的时间、地点，就够滑稽的了。本来，张生一心上京应试，可是他在和尚庙里遇见了莺莺。一双男女，眉目传情，本来是六根清净修身养性的地方，

竟成了培育爱情的苗圃。而这段奇遇，偏又发生在莺莺居丧期间。按封建礼法规定，“父丧未满，未得成合”，何况其父灵柩还在寺院里搁着。在应尽“孝道”的时刻，莺莺把老夫人一向的教导置于不顾。剧本这样的安排，分明是对封建礼法的揶揄，观众稍一玩味，自能会心微笑的。

在王实甫笔下，张生本是个聪明忠谨、器宇不凡的人物，可是当他堕入了情网，却变得呆头呆脑，成了个“不酸不醋的风魔汉”。他在佛殿上撞见了莺莺，猛然惊叫：“我死也！”那傻傻呆呆的神态，已使人忍俊不禁；后来遇到红娘，开口就说：“小生姓张名珙，字君瑞，本贯西洛人也，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，并不曾娶妻。”那一番毛遂自荐式的说白，更使人捧腹大笑。在“赖婚”一场，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，一定可以和莺莺成婚。他一早起来，精心打扮，“皂角使过两个也，水也换了两桶也，乌纱帽也擦得光挣挣的”，一心等待崔家来请，憨态可掬。谁知道老夫人变卦悔婚，他始而目瞪口呆，继而气急败坏，还直挺挺地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，声称要上吊自尽。这淋漓尽致的表现，委实令人喷饭。显然，作者既写张生对爱情的执着追求，又揭示他酸不溜秋的书呆子气，把这个傻角可爱亦复可笑的性格展现无遗。

崔莺莺同样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，她外表文静端庄，相国小姐的身份，使她不得不做出“好人家风范”，但是，她内心涌起的爱情波澜，实在无法平静。她既掩盖真情，又经常无法自己，当内心一旦失去平衡，举动便变得滑稽可笑。像在“赖婚”一场，老夫人着她见客，她起初装病不肯；红娘告诉她，来者乃是张生，她就赶紧说：“若请张生，扶病也索走一

遭。”态度的急遽变化，显得张皇拙劣。加上红娘在旁边“发科”，衬托她的失态，显得十分逗人。在戏里，王实甫对崔莺莺善意地嘲弄，真实地刻划出名媛淑女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矛盾的心情，使观众在笑声中获得美的享受。

王实甫除了创造张生、莺莺两个喜剧形象以外，还让其他人物都带上喜剧色彩，像红娘的机敏刁钻，惠明的粗豪古怪，郑恒的猥屑愚蠢。他们的许多举动，给观众带出一连串笑声。就连冷若冰霜的老夫人，在“拷红”一场被红娘说得张口结舌的神态，也颇令人发噱。正由于《西厢记》的戏剧冲突，是在那些充满喜剧性的人物之间展开，因此，尽管戏的主题是严肃的，斗争也是曲折的，而戏的格调，却明朗轻快，贯串着乐观主义的精神。

在《西厢记》出现后约三百年，剧坛又诞生了一部杰作《牡丹亭》，它一问世，“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。

《牡丹亭》的作者汤显祖，身历明代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。在这个时期，城市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农民大起义也正在酝酿。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，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怀疑，涌现出李贽、徐渭等一批具有异端思想的人物。汤显祖对明王朝曾经有过幻想，他向皇帝上了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大胆抨击现实的政治状况。此举震惊朝野，但他却被贬官，并早早结束了政治生涯。

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，他写过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记》、《南柯记》等四部传奇，人称为“临川四梦”。《牡丹

亭》是四梦中最优秀之作。

和《西厢记》一样，《牡丹亭》写的也是男女爱情问题。汤显祖在“题词”中说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他认为，真诚的爱情是可以超越生死的，因此，他在话本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的基础上，创造了一部揭露封建制度种种黑暗，歌颂爱情、歌颂人生的浪漫主义的戏剧。

在明代，妇女的命运，比《西厢记》反映的元代更为悲惨。封建卫道者为了挽救封建社会大厦将倾“礼崩乐坏”的局面，大大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箝制。表彰妇女“节烈”，便是与鼓吹忠孝悻鼓相应的舆论。据《明史》载，明代建国后，节烈妇女的事迹，“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县志者，不下万余人”。《明史·烈女传》所记烈女之多，超过《元史》等史书的四倍。在封建礼教把人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氛围中，汤显祖突出地表现青年对爱情的热切追求，有着很特殊的意义。

在《西厢记》里，作为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老夫人，既自私，又歹毒，她不惜出尔反尔，想方设法压抑青年对爱情的追求。在《牡丹亭》里，像老夫人那样的角色是没有的，杜宝是清官好官，杜母是贤妻良母，他们对女儿很注意管束，但对女儿的爱也溢于言表。正是出于对女儿的爱，他们精心地把她像鸟儿一样，供养在金丝笼里。

当杜丽娘萌发爱情的追求时，她并不像莺莺那样和封建家长展开正面冲突。《牡丹亭》艺术构思独特之处，在于强调杜丽娘与她所处的环境发生尖锐的冲突，强调她的内心在自我交战。

杜丽娘“一生儿爱好是天然”，爱好天然的美，天然的情与性，渴望人生不受捆绑，自然而然，自由自在。然而，她所处的环境，她所受的教育，以及社会现实的各种制度，却不容许爱好天然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。她不像莺莺或张生，有一个具体追求的意中人，也不存在父母直接干预她密约幽期的问题，但是，笼罩着她的却是一个无形的、无处不在的网，她连恋爱的机会也没有，只能靠幻想来宣泄自己的感情，在梦境中获得爱情的幸福。一旦梦醒，回到现实，理想随即破灭。

杜丽娘因情成梦，因梦而死。在阴间，她得到阎王的帮助，找到了梦里的意中人，后来竟得回生。这浪漫主义的写法，本身包涵着对现实的否定。因此，杜丽娘在“三春好处无人见”的花园里流连忘返，寻找破碎的梦；其魂灵与意中人追逐幽媾，其间交织着爱与恨、兴奋与低回、满足与失落的情绪。与此相配合，汤显祖把戏剧环境写得时而明朗，时而沉郁，于是，整部戏，呈现出悲喜交集、希望与绝望纠结的独特格调。十九世纪末，崇尚东方艺术的美国著名画家詹姆斯·惠斯勒，画了一幅题为《玫瑰色与灰色的合谐——缪克斯女士像》的画，以冷暖交集的色彩，描绘了一个忧伤而又瑰丽的上层妇女形象，在世界画坛上享有盛誉。杜丽娘的形象，以及《牡丹亭》的风格，不也是玫瑰色与灰色的合谐吗？我们认为，了解这一点，就可以把握住《牡丹亭》的特色。

《牡丹亭》的戏剧冲突，和《西厢记》一样，环绕着爱情问题而展开。但是，杜丽娘和莺莺不同的是，她除了希望得到意中人以外，还想到更深、更远，所谓爱好“天然”，包含着希望个性不受束缚的愿望。在“寻梦”一出，春香说“夫人分付早

饭要早”，杜丽娘忽然提出：“你说人生在世，怎生叫做吃饭？”乍一看，这提问毫无道理，其实，它是有深刻意义的潜台词。明代，理学家要求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，李卓吾针对这种论调，在《焚书》中提出“穿衣吃饭，即是人伦道理”，认为饥则食，寒则衣，顺从生理自然而然去做，就是人生。杜丽娘的发问，正是明代具有异端思想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。她又唱道：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”可见，她追求的是包括爱情自主在内更为广阔的空间，是一个可以任随个人支配的天地。就这一点而言，《牡丹亭》比《西厢记》更有思想深度。悠悠三百年，社会在发展，汤显祖的目光，自然要比前辈深邃一些。

继《牡丹亭》之后，清初剧作家洪升写了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剧作《长生殿》。人们说这是“一部闹热《牡丹亭》”。

在明朝灭亡后的第二年，洪升出生于杭州。他在一生中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，只当了二十多年的“太学生”。大约在1688年左右，他完成了《长生殿》的创作。这个戏一上演，立刻轰动剧坛。1689年，佟皇后去世，有人在“国丧日”观演《长生殿》受到弹劾，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洪升也受到拖累，被革去太学生籍。这就是戏剧史上所谓“《长生殿》之祸”。

《牡丹亭》强调“情”，《长生殿》也以写情为重点。洪升说：“今古情场，问谁个真心到底？”他认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，是最终能经受考验的，“精诚不散，终成连理”。不过，洪升对情的看法，较之汤显祖又有新的拓展，“臣忠子孝，总由情

至”。他试图把忠孝之情与男女之情沟通起来，使“情”获得合法的地位。

-《长生殿》描绘的是宫闱中皇帝和妃子的情缘。由于杨李身份的特殊，他们的爱恨悲欢，必然与唐王朝的政局纠结在一起。大家知道，封建王朝盛衰兴替的轨迹，往往会惊人地相似，洪升对李隆基“弛了朝纲，占了情场”的描写，实际上有着普遍的意义。他在《长生殿·自序》中指出，“乐极哀来，垂戒来世，意即寓焉”，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在明末清初，选择杨李故事作为创作题材的深意。

历史上的杨李婚姻，实际上是一宗政治买卖。不过《长生殿》所写的杨玉环与李隆基，却有真挚的爱情。当然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有一个由不专一到专一的过程；他们的情缘，也不同于一般少男少女的爱情；他们的命运，更不同于在家长制压迫下许多青年男女的遭遇，但是，他们的悲剧，依然是封建制度派生的恶果。

在《长生殿》里，杨贵妃要求李隆基对她感情专一。后宫佳丽三千人，这三千人都是竞争者。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，她必须牢牢地控制着李隆基的感情，否则，她只能落得个深宫怨妇的下场。在《夜怨》一出，她与梅妃争宠，不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江采蘋，江采蘋，非是我容你不得，只怕我容得你，你就容不得我。”请看，她一方面在宫闱里纵横捭阖，一方面在心房里也暗流泪血。

在封建时代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中，妻子，包括皇帝的妻子，只能是丈夫的奴隶。杨玉环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，所以一直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当然，如果她安于命运的安排，甘

心任由主人的摆布，她也许可以安安稳稳地享受金丝笼里的生活。问题是，她不肯任由李隆基分配感情，她要独自俘虏李隆基，控制本是控制她的“奴隶主”。于是，她的行为表现为专宠，表现为封建时代认为不足称道的“妒”。

杨玉环的专宠，这要包括梅妃在内的三千佳丽为她作出牺牲。在这方面，作者同情受损害的宫女；同时，当杨玉环和用情不专的李隆基作斗争时，作者又认为她是受害者，他的同情，显然是在终日怀长门之惧的杨玉环方面。所以，作者虽然写她三番四次地表现出极端的妒，但强调这是“情深妒亦真”，认为她的排他行为，乃是专一地爱的表现。

应该说，杨玉环的妒，亦即要求获得对等的爱，这当然是合理的，但在封建时代夫权的统治下，这种合理的要求被视为“恶行”。《大戴礼·本命》载：“妇有七出，不顺父母，去；无子，去；淫，去；妒，去；有恶疾，去；多言，去；窃盗，去。”敢于干涉丈夫的私生活，这被称之为妒，就有足够的被驱逐的口实了，何况，杨玉环干预的是有权享受三宫六院的皇帝！所以，杨玉环一方面气势汹汹，一方面心如撞鹿。每一次因妒被贬，她总是要承认错误，后悔孟浪。

从人类社会婚姻关系发展的轨迹看，夫妇爱情专一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，是社会发展到男女平等这一阶段所结下的甜蜜的果实。我们说杨玉环的要求合理，是指婚姻关系必然朝着她所要求的方向发展。然而，杨玉环处在一个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的时代，“历史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”，所以“出现了悲剧的冲突”。（见恩格斯《给拉萨尔的信》）等待着她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。我们认为，洪升注视着

在一夫多妻制底下妇女的命运，提出“爱情专一，精诚不散”这一个不可能实现却又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理想，无疑是民主思想的表现，是封建时代妇女要求解放的曲折反映。

在《长生殿》里，洪升对杨李情缘所产生的后果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他写杨国忠：所以能“官居右相，秩爵司空”，靠的是杨玉环获宠。而在杨国忠的帮助下，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得以免罪，种下了变乱的祸根。很明显，杨李交欢带来的是权臣勾结，而当李隆基越是无法摆脱杨玉环，杨氏一门就越是得到更大的利益。所以，在《幸恩》、《献发》、《复召》等出之后，洪升便写杨氏兄妹竞建新第，“这一家造来，要胜似这一家”，“朱甍碧瓦，尽是血膏涂”。无疑，杨玉环在专宠的斗争中，她是胜利者，她在爱情问题上排他性的要求也俨然可期，但是，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，李隆基越来越不理朝政，杨国忠越来越专权，安禄山也乘机坐大。于是，为霓裳羽衣舞伴奏的音乐，是使人魂飞魄散的渔阳鼙鼓，杨玉环自己也成为葬身马嵬坡下的替罪羊。从《定情》到《埋玉》，杨玉环逐步掌握住开启李隆基心房的钥匙，而这钥匙又给她打开了通向死亡的墓门，这真是她无法逆料的悲剧。

杨玉环所处的特殊地位，决定了她不可能实现爱情专一的理想，唯一解脱的办法，是让她离开人间，在不存在的虚空中实现“历史必然的要求”。在《长生殿》的后半部，作者是这样做了。他写杨玉环死后灵魂儿追逐着李隆基的銮驾，“愿一灵早依御座，便牢牵袂袖黄罗”，卒而感动了上天，终了夙愿。洪升首肯人们说《长生殿》是“闹热的《牡丹亭》”，也正是杜丽娘在阴间“一灵儿咬住不放”，和杨玉环“精诚不散”的追求如出

一辙。由于她们在生前所冀望的均属当时不可能实现的要求，因此，等待着她们的也必然是悲剧的命运，只不过杜丽娘悲剧命运的制造者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，而杨玉环悲剧命运的制造者，恰恰就是她自己。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尊贵地位，使她无法实现爱情的合理要求，使她永远沉沦在痛苦的深潭里。

在《长生殿》的后半部，作者集中笔力写杨玉环与李隆基的“悔”。李隆基后悔弛了朝纲，后悔用情不专；杨玉环则后悔“在生所为”，于是，杨、李的感情与灵魂，得到净化。作者“嘉其败而能悔”，表现自己对悲剧人物极大的同情。作为要求矛盾尖锐集中的戏剧，《长生殿》后半部的情节安排，有拖沓松散毛病；但作为兼具抒情效能的戏曲，它又以优美婉丽的唱词，淋漓尽致地宣泄杨李感到永远遗憾的心绪。这种追忆、悔恨、感慨以及对失去的美好事物的眷恋，实际上又包括洪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。他一方面肯定情，追求真挚执着的爱情，一方面又觉得“情缘总归虚幻”。总之，既渴望，又悲凉；既追求，又幻灭。经世致用的思想与色空观念互相渗杂，这体现了清初知识分子一种典型的心态。

如果说，以历史为题材的《长生殿》，是在王朝兴亡的背景下，展示杨李的爱情生活；那么，稍后于它的《桃花扇》，则是一部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的历史剧了。

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，生于1648年，山东曲阜人，孔子的六十四世孙。孔尚任于青少年之际，正值明清易代，战乱频仍。他目睹山河破碎，曾想隐居不仕。但后来清政权逐渐稳定，他也改变初衷。当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，他被选为御前讲

经人员，受到皇帝赏识，以后奉召到京任国子监博士。跟着，被派往参加治河工作，在江南一带流连四五年之久。

在江南，孔尚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，结识了许多明朝遗老，凭吊过故国文物，思想上又起了激烈的变化。本拟在宦海扬名的他，陷入了深沉的反思之中，他回京后写出的《桃花扇》，正是经过体验反复思量的产物。

孔尚任为什么要创作《桃花扇》呢？他在《桃花扇·小引》中说得十分明白：这就是通过“场上歌舞，局外指点”，让观众“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？败于何事？消于何年？歇于何地？”达到“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一救”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孔尚任是要表现南明亡败的过程，总结历史的教训。

如何总结南明亡败的教训呢？出身于地主阶级、深受儒家封建思想影响的孔尚任，不可能全面、准确地分析南明的败亡的原因；受过清朝恩泽，而且处在民族问题上诸多讳避时代的孔尚任，也不可能秉笔直书满洲铁骑对江南的蹂躏。根据他的认识水平，他只能看到南明的灭亡，主要是因为福王任用了权奸。“权奸者，魏阉之余孽也；余孽者，进声色，罗货利，结党复仇，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。”（见《桃花扇·小识》）因此，《桃花扇》虽涉及农民起义问题，但态度是错误的；也涉及民族斗争问题，但笔调是隐晦的。孔尚任只把一腔怒火，尽情向马士英、阮大铖之类的权奸发泄。整个戏，也只围绕着马、阮和复社文人以及平民大众的冲突而展开。不过，话也说回来，权奸误国，的确是促使南明复灭的重要原因。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面貌，把握住社会的主要矛盾，但是揭露出当时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，提出了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教

训。

南明兴亡，时间虽短，但也头绪万端，如果在舞台上一味罗列史迹，势必如断烂朝报，使观者味同嚼蜡。孔尚任则以李香君、侯方域的故事为经，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纬，交织成南明时代的历史图景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以侯、李定情的一柄扇子，牵动整个时代，“南朝兴亡，遂系于桃花扇底。”

《桃花扇》一开始，便写复社领袖之一的侯方域，在南京流连诗酒，爱上了江南名妓李香君，可是阮囊羞涩，两袖清风，无法如愿。那时候，阮大铖也在南京闲居，正受到复社文人围攻排斥，狼狈万分。为了讨好复社诸人，改变不利的处境，他拿出金银财物，请杨龙友赠送给侯方域，以便俟机拉拢。侯方域不晓得袖里乾坤，欣然接受杨龙友的馈赠，梳拢了李香君。侯、李的爱情也和当时的党派斗争联结在一起了。

不过，阮大铖的阴谋并没有得逞，因为李香君识穿了其中把戏，退回“妆奁”，阮大铖自讨了一场没趣。这一来，以李香君、侯方域为一方，和以阉党分子阮大铖为一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老羞成怒的阮大铖，诬告侯方域是左良玉“谋反”的内应，逼使侯方域“仓皇辞院”。接着，阮大铖与马士英迎立福王，垄断了朝政。为了报仇，他让另一个阉党分子田仰强娶香君。香君誓死不从，“竟把花容，碰了个稀烂”，鲜血溅红了她和侯方域当初订盟的诗扇。后来，杨龙友据以画成桃花，这就是“桃花扇”。

从侯方域题诗到李香君以血溅扇，这两个强烈的戏剧动作，展现出侯李的合与离，欢与愁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标志着复社和阉党分子力量的消长，标志着南明内部斗争形势的变化。

透过桃花扇影，观众们可以看到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。

侯、李被迫分离后，剧本情节沿着他们不同的经历，分成两线发展。

侯方域逃出南京，投靠了史可法。侯方域参赞戎机，建议史可法拒绝马士英、阮大铖在迎立问题上的拉拢。但马、阮等人绕过了史可法，“约会四镇武臣及勋戚内侍”，把福王迎到南京，迫使史可法承认既成事实。随后马士英等人凭着拥立之功，独揽朝政，把史可法排斥在外。侯方域也就随着史可法督师江北。谁知协助史军设防的四员大将，不听指挥，他们“争坐位失了同心好，斗齿牙变了协恭貌”，竟在帅府内大动干戈。这期间，侯方域竭力斡旋，费尽心血。后来，四镇之一的高杰敌不过其他三镇，史可法就命侯方域作为高杰的参谋，远赴河南“防河”。谁知高杰性气乖张，结果部下离心。黄河一线，千里空营。本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南明王朝，便迅速沉没。

“笑中兴封了一班小儿曹”，南明中兴竟同儿戏，侯方域作为区区的军务参赞，当然无法力挽狂澜。但是，由于作者把他放置在斗争漩涡之中，让他亲眼看到迎立的角逐，四镇的内哄，高杰的溃败，这样，他就成了南明将帅无能、军队腐败的见证人。朝堂之外种种混乱的图景，便从侯方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引出。

李香君留在南京，也备受折磨。“南明天子春心动，凤纸签名唤乐工”。被封为内廷供奉的阮大铖，搜罗秦淮名妓清客，为皇帝排演“一代中兴之乐”。李香君被选入宫，自然是不幸的，但作者却通过她坎坷的遭遇，把朝堂内部大臣的卑劣无